

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发展路径、制度与经验

——2018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年会综述

陈 俭 宋士云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2018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在此背景下，2018 年 4 月 20 日—22 日，“2018 年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年会”在聊城大学召开，并将会议主题确定为“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发展路径、制度与经验”。此次年会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聊城大学商学院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大学、贵州财经大学、南开大学、扬州大学、山东大学、聊城大学等单位的 7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首先致辞，他指出，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研讨“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发展路径、制度与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工业化发展、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要提高我们的话语权，需要有完整的解释与理论创新；中国创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发挥经济史的作用。聊城大学副校长王昭风教授在致辞中也强调，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年会共收录论文 40 余篇，专家学者们围绕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进行了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业化、城镇化与“三农”问题

武力就改革开放与中国工业化提出 3 个问题：一是怎么看待 1978 年以前的工业化。他认为 1978 年前中国选择苏联模式是理性的，虽然计划经济的微观效益不高，但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国家稳定的双重目标，前后是继承关系。二是怎么看待改革开放 40 年的工业化。从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资本积累看，中国改革开放不是颠覆世界秩序，而是为了合作共赢。三是怎样评估工业化水平。中国产业结构处于中低端，需要供给侧改革。孙圣民、姚侃从工业改革的初始条件、路径选择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工业发展的关联性。瞿商、许天成认为当代中国的半工业化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经济逻辑，随着中国劳动力数量的逆转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以及新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冲击，中国的半工业化正在快速走向完全工业化。叶明勇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认为与城镇飞速发展相对应的是农村的衰落，随着农业本身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完成，城镇和乡村将呈现一种新型的良性互动发展关系。

李文探讨了中国“三农”问题演进的 3 个必然趋势，即农村耕地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撤村并乡与农村居民点治理、培养新型农民，并强调乡村建设重在推进城乡统筹。康金莉、陈俭以发展的视

〔作者简介〕 陈俭，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信阳，464000，邮箱：chenjian12778@aliyun.com。宋士云，聊城大学商学院教授，聊城，252059，邮箱：songshiyun@lcu.edu.cn。

角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权利重构的历程,提出农民权利的重构最终以二元经济体制全面解体、城乡居民平等权利体系的构建为终点。周肖以城乡户籍权益差异化为研究视角,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权益的变迁。王瑞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农”问题进行了宏观考察,分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陈艳丽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农业资金投入政策发展演变的脉络、特点,并对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进行了评价。郑有贵通过回顾40年来小岗村首创大包干之争,探讨了考察历史逻辑对于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意义,认为梳理纵向的长时段的历史逻辑和横向的大结构逻辑,还历史之真实,对于避免孤立、机械、片面思维,不可或缺。

二、贸易与对外经济关系

郭立珍阐述了2001—2008年中国零售业格局的变迁,指出这时期中国零售业形成了多元市场主体相互交融的格局。刘巍对改革开放40年的广州外贸与外资利用情况进行研究,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宏观经济经历了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转变的时点约在1996年。林盼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引进130个项目进行了分析,认为由国家出面引进外资进行技术改造,出现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投资与需求错配。王蕾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经历5个阶段,指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泛滥下,中国坚持推进全面开放,注重经济全球化“贡献者”身份。张丽指出美国对华贸易清单直指中国高科技产品,反映了西方过去几百年来一贯的经济战略方针,即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永远占住和守住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高端地位,阻碍和防止发展中国家经济从低端向高端的成功转型。杨帆从中美经贸关系历史看两国政治关系发展,指出在诸多分歧面前,能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力量是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同时,还强调用中国价值观念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金融与经济体制改革

宋士云阐述了3个版本的《巴塞尔协议》与中国银行业监管变迁的问题,指出随着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完善,它所体现的银行监管思想不断深化,已成为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并在规范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把国际标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积极推动银行业改革与发展,实现了国际标准的中国化。冷功业回顾了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进程,提出了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要与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相匹配,探索适合自身的国际化发展道路。朱海城通过对浙江民间金融的研究,提出了民间金融制度变革主导民间金融组织演化的分析框架。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魏众分析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转型思想,认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和思想开放为转型奠定了基础;80年代初期至中期,中国经济学家向国外同行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末期,转型历经波折,最终在90年代初期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转型目标。同时,他还解读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特”字是如何逐渐显现的。姜长青认为1978年前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对苏联模式、平均主义以及国内主要矛盾3个方面的超越。萧冬连通过解读1977—1992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分析中国市场化改革突破如何成为可能。王年咏、张立娟以高经济增长期、高国民储蓄率、高外向经济依存度为标准,选择10个经济体与当今中国进行比较,对中国经济失衡的国际时空特征进行再考察。

四、民生与环保

朱高林认为,中国居民消费进入了“双轮驱动”增长模式时期,表现在消费主体、客体、品质、途径

和市场从单轮驱动向双轮驱动转变,并分析了“双轮驱动”增长模式的生成路径。于东阳对1992—2012年中国工资水平的演变进行探析,认为中国实际工资水平呈现出中速大波动和高速小波动的阶段性特征,并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从偏离程度较大转向趋于同步。公维才基于社会公正视角剖析了新农保制度,认为新农保制度与社会公正理念存在偏差,并提出优化策略。张静宜梳理了农村社会保障改革以来的主要争论,提出农村社会保障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切忌简单把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推向市场、个人或集体。针对环保与民生的矛盾,张连辉分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环保史,通过对环保决策过程与逻辑的研究,探讨了环保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五、质量标准与创新发展

董志凯在探究质量与管理体制、发展速度的辩证关系时,提出要正视制造业、基本建设、文教领域中的质量问题,提高质量要从改进管理体制入手,靠市场与竞争提高质量、靠管理提高质量、通过引进提高质量,协调速度与质量、成本与质量的关系;同时,强调在质量管理中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马中东、王肖利认为,团体标准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分析了团体标准建设的特征与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于文浩把改革开放40年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路径,划分为4个不同阶段,总结了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脉络与经验。段艳、吴大华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先后取得“顶云经验”“毕节试验”“多彩贵州”“云上贵州”等经验及其对中国创新的影响。

六、关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研究

历史不能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继承与发展关系,因此对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必然会涉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内容。孙建国、高美红以河南省工商界生活互助金为中心,对私方人员救济制度及其作用展开分析。常明明基于中南区5省35个乡1953年经济调查总结,分析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路径取向。曲韵对私营进出口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行考察,得出私营进出口业在1956年合营不是过快过急,而是水到渠成的结论。龚关对1949—1978年政府主导下的农贷制度及其特点进行探究。李飞龙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前期贵州农业税征收标准从赋元到确立常年应产量的演变过程。冯兵兵对1949—1960年间中国农田机电排灌事业的兴起及其原因进行探析。岳仁崇考察了20世纪60—70年代湖北省绿肥的推广过程及贡献。黄英伟利用1971—1981年苏北生产队的例子,实证分析了关系对集体制农户收入的影响,认为与生产队长关系越好的农户家庭收入越高,与队长关系越差的农户家庭收入越低,这一研究对理解集体制农业内部的发展规律,农户间分化和劳动积极性等提供了帮助。

另外,赵学军对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发展40年进行了总结,强调未来几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5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是从中国经济史出发,加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二是多元融合的研究范式将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创新的出路;三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加密切,也只有二者的紧密结合,才能搞清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四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五是长视野、宽视域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打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碎片化问题。

(责任编辑:黄英伟)